

# 构建“水安全命运共同体”

## ——从博弈到共享的跨境水资源分配

吴凤平 谭东升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在气候变化和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跨境水资源分配已成为影响流域国关系的敏感因素。跨境水资源分配从博弈到共享模式跨越具有一定的通过现实性。通过剖析跨境水资源分配博弈案例,并从要素判断、义利观念、策略抉择、损益评估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基于习近平主席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出了构建跨境河流“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并分析了其理念源起、理论基础和理想追求,从保障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探究了相应的合作路径。

**[关键词]** 跨境水资源;水安全命运共同体;共享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8.06.013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8)06-0143-08

在全球气候变暖、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全球跨境淡水资源的短缺情况日益严重,跨境水资源<sup>①</sup>对于各国发展的重要性已愈加突出。全球范围内共有跨境河流 286 条,涉及 151 个国家,流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42%。目前,在全球跨境河流中,可能引发国际争端的跨境河流有 150 多条,主要位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集中地区,引发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是水资源权属不清、分配不公以及相应保障体系的缺失。世界性水危机已经成为未来全球风险格局中的核心风险,跨境水生态安全、跨境水资源冲突,及与此相关的地缘水政治等问题,因涉及全球水安全而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跨境水资源的分配由于最易在流域国之间产生利害冲突,备受各流域国关注。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都有加大对国际河流开发的趋势,跨境水资源的分配模式在悄然发生改变。

### 一、文献评述

现有初始水权分配及跨境水资源分配方法研究,大多是基于博弈的配置模式站在解决矛盾的视角而展开。李奔(2009)<sup>[1]</sup>利用博弈论方法建立了国际河流水量分配的广义非合作二维博弈模型。说明了该问题纳什均衡解的存在,并由此得到一阶优化条件,解得流域各国的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跨境水资源确权与分配方法及保障体系研究”(17ZDA064)

**[作者简介]** 吴凤平(1964—),男,江苏泰州人,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水资源技术经济、水权管理等。

<sup>①</sup>关于跨境水资源概念,不同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条约以及相关文献的表述各有不同,如:国际水道、国际河流、共享水道、共享河流、国际流域、跨国河流、跨界水道、跨界水体、跨界水资源、跨界水域等。而这些表述根据其使用的目的、对象及其领域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目前没有统一的界定。

优河道引水量和其他途径获得水量。陈艳萍、吴凤平(2010)<sup>[2]</sup>认为初始水权分配不均产生纠纷的根源,通过“水权过多区”群体和“水权过少区”群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群体的复制动态和演化稳定策略,以及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来调整各区域的水权分配,可以有效化解初始水权分配中的冲突,从而构造和谐有序的用水环境。Kerachian R、Fallahnia M等(2011)<sup>[3]</sup>研究了基于水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综合配置问题,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两种冲突博弈模型,并将模型应用于德黑兰省的水资源配置。华坚、吴祠金等(2013)<sup>[4]</sup>对上下游型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冲突进行了博弈分析。黄德春、陈陆滢等(2015)<sup>[5]</sup>建立了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各个国家对于水量分配的演化以及稳定策略,认为可以通过演化稳定策略调整各国家之间的分水量,可以有效地化解流域国家间的冲突。

目前针对跨境水资源分配大体上可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各流域国合作开发跨境水资源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其一,由于水资源的自然属性,造成跨境水资源无法按照政治边界进行分配;其二,由于各流域国的水资源需求程度、开发规划、用水理念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同,带来困难。匡洋、李浩等(2018)<sup>[6]</sup>认为气候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给跨境水资源的合作造成诸多困难。胡文俊、黄河清(2011)<sup>[7]</sup>认为由于跨境水资源本身的特点与问题、各国利益、政治环境、国际涉水制度、观念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相邻国家之间的水资源需求、水环境污染、水域环境保护的争议也会随之增加。

第二,跨境水资源是连接各个流域国的重要生命基础,也是彼此建立经济贸易桥梁的重要纽带,合作共享是和谐发展的长远之计。钱人瑜、钱振健等(2015)<sup>[8]</sup>认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实施需要更为紧密地合作,跨境水资源管理要做到既能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又能兼顾到共同流域国的利益及需要;既需坚持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又要保证相关流域的生态平衡;既要维护当下已有的水资源效益,又需要兼顾到相关水资源的长远发展。王洪亮、周海玮(2017)<sup>[9]</sup>认为我国跨境水资源是可以基于共同利益的理念,逐步地去进行跨境水资源管理。如水电开发企业不仅能为国家带来经济效益,还是对外传播的有效平台。

基于博弈视角来解决跨境水资源管理问题,往往是站在水权分配可能会引发矛盾的前提来进行的,而这一出发点往往不利于共同发展。随着共同利益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跨境水资源管理合作的初衷是避免和化解流域国间的冲突,并能够在某些局部地区取得单目标收益以及双边跨界合作模式等,逐步向多目标、流域综合管理合作等模式演进,循序渐进地实现流域乃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提出共享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命运共同体”构建跨境河流“水安全命运共同体”,具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

## 二、跨境水资源分配博弈状况及深刻反思

20世纪之前,跨境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一直困扰着流域内合作,流域各国共享着一条河流,彼此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等,加上水资源分布不均,各流域国在跨境水资源利用上的竞争和矛盾冲突日益激烈,特别是一些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其水资源的分配更容易引发冲突,甚至是政治纷争和军事行动。

约旦河位于中东地区,中东所有的资源中最容易引起危机的是水资源。20世纪90年代

前,约旦河内进行了唯一一次约翰斯顿谈判,但谈判国未能就最终结果达成共识。1954至1955年,因以色列和阿拉伯对于流量配额提出异议,导致美国对约旦河流量分配冲突进行调节的计划搁浅。尼罗河共有十一个流域国,20世纪50年代,尼罗河各国相继获得主权,尼罗河流域的流量配额引发水资源所有权之争。尽管在20世纪中期,尼罗河的下流域国埃及和苏丹签订了流量分配条约,但条约没有考虑上游流域国的合法权利,遭到了上游流域国的强烈反对。多瑙河是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国际河流,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沿岸国家在多瑙河干流兴建水电梯级,其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修建水资源工程问题引发矛盾,导致双方长达二十年的多瑙河国际争端,直到1997年才由国际法庭判决解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主要流域国有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其主要矛盾在于各国在水体工程建设中导致其他流域国收益受损。恒河-雅鲁藏布江流域国家主要包括尼泊尔、印度、孟加拉、不丹和中国,其中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主要冲突的原因在于不平等的水分配和利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主要冲突原因是水资源的使用收益问题。

以纷争、冲突为代名词的跨境水资源分配一直是困扰乃至阻滞流域国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环节,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 (一)流域国在“要素判断”上过于看中自然因素的制约影响,忽视社会因素的弥补力量

跨境水资源是流域内国家界定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的一个重要表征。由于流域内国家敏感于获得、维系或失去某种水权利,因此,跨境水资源分配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国际问题。它不仅受到水资源时空分布、开发利用现状及供需平衡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不同跨境流域环境、流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同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流域国家间的合作基础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诸多流域国在先天水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是可以通过社会因素来削弱尖锐的冲突的。因此,在跨境水资源确权与分配中,关注水情和水文等“自然”影响因素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地缘、政治、法律、经济、安全、外交和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 (二)流域国在“义利观念”上过于强调对本方获利的保护,而忽视彼此信任和相互包容

在跨境水资源的分配以及利用上,对于公平合理的理解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这很大一部分会受到认知主体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世界观等因素的影响。上下游流域国之间的互信度低、国情各不相同、均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于公平合理的理解是很难达成共识的,一旦产生利益冲突很难调节。例如在水电开发上,上游国家发展经济会给下游国的水资源生态安全造成影响,但与此同时也会起到防洪以及增加下游地区水力发电的相关收益的作用。相反地,下游国家的行动也会影响到上游国家。因此,不顾下游国家的利益单方面的进行水电开发,或抑制上游国家的发展都是不明智的举措,甚至会引发矛盾纠纷。吴凤平(2010)<sup>[10]</sup>认为跨界水权配置必须实行协商和协调机制,兼顾上下游、左右岸的用水者权益,减少配置过程的争议,提高配置结果的和谐性,从而增加上下游国家互信度。

#### (三)流域国在“策略抉择”上过于依赖国际经验,而忽视对河流自身特点的认知

共同利益需求是流域国家间实现合作、形成国际机制的基础<sup>[11]</sup>。协调各流域国在跨境水资源管理和利用上的利益冲突,在权衡利弊中尽量实现利益多方最大化,需要依靠更加完善明确的国际法律以及各流域国之间的合作共享。往往出现跨境水资源的矛盾纠纷,都会参照国

际上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并没有针对河流自身特点以及流域国国情进行考量。而事实上,跨境河流因区位、时机、流域国关系等不同,其水资源分配机制是迥然不同的。

(四)流域国在“损益评估”上过于信赖“零和”博弈,忽视合作可能带来的利益“变和”

零和博弈的双方一般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在跨境水资源分配矛盾上,相关流域国若将视角锁定在局部利益上很容易不会考虑到整体利益和未来发展。各流域国在做决策时往往以自己最大化利益为目标,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既不能实现自己也不能实现全流域的利益最大化。虽然国际河流合作上依然存在诸多障碍,但具有其现实可行性,尤其当利益有所交集时,更加容易达成。各流域国若能聚焦经济、安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利益上的合作而不是只关注水资源,那矛盾冲突中的利益由“零和”到“变和”的转变是可实现的。

### 三、跨境河流“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一)“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源起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中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后在诸多演讲及政要会面中,习近平主席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次次深入地阐述这一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的发展中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及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文化、经济交流<sup>[12]</sup>。国家倡导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sup>[13]</sup>。以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为主线,“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传统“和”文化基础上构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博大的天下情怀。

将“命运共同体”理念延伸到跨境河流水资源管理之中,坚持“和”文化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在国际水资源的合作大背景下,在“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以水为载体,以“利益共享、合作共赢”为准则,以跨境河流的可持续利用、流域国水安全为目标,构建“水安全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流域国共同发展,维护流域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关系。

(二)“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国际河流的开发合作备受学术界关注。“水安全命运共同体”具有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的理论基础。

#### 1.法学基础

国际河流法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有着丰富的国际条约渊源。国际河流法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国际河流利用及其保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包括一般国际河流法、特殊国际河流法和区域国际河流法,涉及国际河流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流域管理等诸多问题。

参考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跨界含水层法草案》、联合国欧经委《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赫尔辛基公约)》、国际法协会《国际河流利用规则(赫尔辛基规则)》与《关于水资源法的柏林规则》等相关涉水国际公约,以及当前国际上围绕跨境水域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的相关区域性公约、双边/多边协定/条约等。这些涉水国际公约具备“公平合理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等相关基本原则和“自由航行、经常交换数据与资料、事前通知”等重要规则的本质特点,国际案例及相关涉水条法选



择的全面性、典型性和适用性都是构建“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据。

## 2. 经济学基础

作为流域国的共享资源,国际河流在流域国范围内具有公共特性。在当前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经济学研究中,产权理论、“公地的悲剧”理论、外部性理论等构成了国际河流水权制度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随着国际淡水资源环境的恶化,各流域国加大对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导致国际河流水资源竞争激烈。由于国际河流的外部性特征,不同流域国对国际河流的竞争性行为会对各流域国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损害国际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因此,清晰界定国际河流产权是解决国际河流领域“公地悲剧”问题和消除外部性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经济学研究中,从“产权”出发是研究国际河流的热点视角,各流域国之间从“收益”和“价值”的角度进行研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实现合作利益的最大化<sup>[14]</sup>。吴风平、章渊等(2015)<sup>[15]</sup>在梳理产权理论学派观点的基础上,界定水资源产权是行为主体通过对水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由以水资源所有权为基础,他项权利为补充的一系列法定权利。

对于国际河流而言,每一个流域国都拥有使用权,但其产权的界定因水资源的流动、共享等自身属性变得十分艰难。Claudia W. Sadoff、David Grey(2005)<sup>[16]</sup>认为在出现产权分歧时,首先敲定国际河流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来构建收益合作分享系统,以此来回避产权界定难的问题。国际河流收益主要覆盖了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四大方面,他们均可以通过合作来进行获取。由于跨境水资源中水具有“用户价值”和“系统价值”,那么在国际河流中各流域国需通过合作共享的方式进行利益再分配达到系统最优。

## 3. 政治学基础

在世界气候变暖、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全球跨境淡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 and 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命线。水资源供应不能得到保证,则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因国际河流自身的连通性和流动性,流域国间合作、管理、开发等行为都可能会产生跨境影响。跨境水资源的分配由于最易在流域国之间产生利害冲突,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地缘安全,备受各流域国关注。

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河流管理的合作,是有助于梳理和剖析主权国家背后动机的。Tafesse(2009)<sup>[17]</sup>认为目前需要加强合作来实现流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通过识别利益的类型、远景以及优化模式来实现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的利益共享。Claudia W. Sadoff、Dale Whittington等(2002)<sup>[18]</sup>等认为在国际河流的水合作中最敏感、最困难的是利益共享。需要在设计跨境流域合作协定时,把合作的重心定在水利益共享上。通过合作实现跨境河流利益共享更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针对跨境水资源权属管理的现实需求,建立“水安全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实现跨境水资源管理从各流域国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向合作共享关系的转变。

### (三)“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共同发展、旨在同求利益和合作共赢;二是强调共同安全,面对共同的威胁共商计策;三是强调共同价值,让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流域国落地生根。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二者相辅相成促进共同价值的实现。多方

依附水资源进行贸易逐渐增多,共赢的价值逐渐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坚持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推进我国外交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sup>[19]</sup>。“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切合我国外交政策,将秉承国际河流流域国合作共赢的原则,搭建总体平稳、均衡发展的关系构架;秉承以己推人、亲诚惠容的理念,以水为依托构建与邻为善的周边国家关系;秉承国际水法的公平公正原则,正确的利益观和真诚的理念,增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秉承坦诚务实原则,针对国际河流特点,加强同各国水资源管理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对外交往。

#### 四、基于“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跨境水资源合作路径

##### (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在我国实施“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2016年“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首次提出,从历史和现实、条件以及障碍突破各个方面权衡利弊,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良性发展,周边环境稳定的重要举措。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可以改善次区域不平衡的状况,也可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被称为东南亚“心脏”的湄公河为流域国众多人口提供了生活所需。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较落后等情况,这对于流域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不小的障碍。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可以促使“澜湄”沿岸各国更好的发展。依托“澜湄”国家的责任担当、荣辱与共,合作共治安全危机,有效改善仅靠一国之力难以控制的次区域航道安全、枪支安全、毒品安全等安全问题<sup>[20]</sup>。湄公河水资源合作随着水资源利用规划(WUP)和流域发展规划(BDP)的出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为跨境水资源开发与分配提供程序和指导方法。

##### (二)构建跨境水资源分配保障体系

公平、合理的水权分配制度是跨境水资源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实现权益共享、责任同担的基础。基于“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在国际水法框架下,依据流域的客观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地缘、政治、法律、经济、安全、外交、宗教等因素,以追求合作共赢、避免两败俱伤为目的,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体系是十分必要的。现阶段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与管理机制不完善,因此,必须加快完善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与管理机制<sup>[21]</sup>。保障体系必须兼顾权利和责任,包括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

###### 1. 建立管理体制

分析跨境水资源利益相关者特征,借鉴境内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的主体构成和纵向垂直管理模式。比较协商、斡旋、仲裁等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模式的效能与福利影响,依据跨境水资源权益争端的不同情景,遴选效率、公平与福利最大的保障模式,建立基于“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的组织机构,探索组织机构的职能与组织架构,设计组织结构的监督管理流程与议事规则,建立基于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组织机构的一体化管理与跨境协商模式。

###### 2. 完善管理机制

基于跨境水资源利益相关方、代理主体、争端处置平台与相关组织机构的利益主张和行为特质,建立与“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一系列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促进国际河流水权确立的流域水权合作机制、保证国际河流水权能够正确实施的水权履约机制以及和谐解决水权矛盾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建立跨境水资源应急管理、信息发布、预留与增量处置、横向补偿等权益保障机制及跨境水资源配置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基于权责对等原则,明确流域国投资分摊、水质保障、信息报送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见图1)。

## 五、总结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各国快速平稳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全球淡水资源危机的加剧,跨境水资源越来越备受关注。本文将“命运共同体”理念延伸到跨境河流水资源管理中,在剖析国际河流分配博弈案例的基础上,建立跨境河流“水安全命运共同体”,探索、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河流水权理论,为我国制定国际河流对外战略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

开展基于“水安全命运共同体”的跨境水资源分配的研究,有利于实现跨境水资源管理由矛盾到合作共赢的演变,更有利于确保跨境流域内双边/多边水安全,促进跨境水资源合作开发,协调跨境流域国之间的用水矛盾,减少水事纠纷和流域国家之间的冲突,从而规范跨境流域国未来的水事行为和促进跨境河流的合作开发。

## 参考文献:

- [1] 李奔. 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决策方法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2009.
- [2] 陈艳萍,吴凤平. 基于演化博弈的初始水权分配中的冲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11): 48-53.
- [3] Kerachian R, Fallahnia M, Bazargan-Lari M R, et al. A Fuzzygame Theoretic Approach for Ground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Rubinstein Bargaining Theory[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0, (10): 673-682.
- [4] 华坚,吴祠金,黄德春. 上下游型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冲突的博弈分析[J]. 水利经济, 2013, (03): 33-36.
- [5] 黄德春,陈陆滢,吴祠金. 基于演化博弈的国际河流水量调整策略分析[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5, (04): 90-93.
- [6] 匡洋,李浩,夏军,杨泽川. 气候变化对跨境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评估与管理框架[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8, (01): 67-76.
- [7] 胡文俊,黄河清. 国际河流开发与管理区域合作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J]. 资源科学, 2011, (11): 2099-2106.
- [8] 钱人瑜,钱振健,李智. 国际跨界河流与边界河流合作比较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2015, (08): 70-77.
- [9] 王洪亮,周海炜. “澜湄合作”视角下国际河流水电开发环境保护舆情监测实证研究——以中国澜沧江流域水电开发为例[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7, (02): 108-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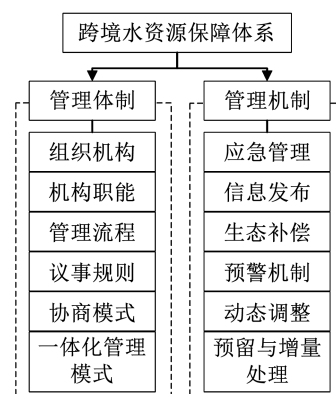


图1 跨境水资源权益保障管理体制与机制框架图

- [10] 吴凤平.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方法研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 [11] 董彦岭. 区域经济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兼论山东的融入对策[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05):155-161.
- [12] 周海炜,高云. 国际河流合作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J]. 国际论坛,2014,(01):8-14.
- [13] 钱彤,熊争艳,刘勃,刘华. 中共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N]. 新华网,2012-11-11.
- [14] 周海炜,郑爱翔,胡兴球. 多学科视角下的国际河流合作开发国外研究及比较[J]. 资源科学,2013,(07):1363-1372.
- [15] 吴凤平,章渊,田贵良.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框架下水资源现代化治理逻辑[J]. 南京社会科学,2015,(12):17-24.
- [16] Claudia W. Sadoff, David Grey. Coop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Rivers A Continuum for Securing and Sharing Benefits[J]. Water International,2005,(04):1-8.
- [17] Tafesse, T. Benefit-Sharing Framework in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s: The Case of the Eastern Nile Sub-basin[J]. Project Workshop Proceedings,2009,19:232-245.
- [18] Claudia W. Sadoff, Dale Whittington, David Grey. Africa's International River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M]. Washingt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2.
- [19] 程国花.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体系及其特色[J]. 社会主义研究,2018,(01):72-79.
- [20] 颜欣. “一带一路”背景下澜沧江-湄公河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 学术探索,2017,(09):46-51.
- [21] 胡文俊,简迎辉,杨建基,黄河清. 国际河流管理合作模式的分类及演进规律探讨[J]. 自然资源学报,2013,(12):2034-2043.

(责任编辑:路春城)

## Building Water Security Community of Destiny ——Cross-border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from Gambling to Sharing

WU Fengping, TAN Dongsheng

(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tensive human activities, how to allocate cross-border water resources has become a sensitive factor affec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drainage basins. The transition of cross-border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from gambling to sharing has certain reali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llocation game cases and makes a deep consideration on factors judgment, righteousness concepts, strategic choice as well as profit and loss assessments. 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of Chairman Xi Jinping to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nstructing cross-border river "water security community of destiny", expounds its idea orig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ideal pursuit, and explores its path of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rante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Key Words:** Cross-border Water Resources; Water Security Community of Destiny; Sharing